

写意政治

近代早期法国政治文化
中的性别、图像与话语

汤晓燕 著

Representation of Politics

Gender, Image and Discourse in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意政治：近代早期法国政治文化中的性别、图像与话语 / 汤晓燕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6
ISBN 978-7-308-19171-5

I. ①写… II. ①汤… III. ①政治文化—文化史—研究—法国—近代 IV. ①D7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99224号

写意政治：近代早期法国政治文化中的性别、图像与话语 汤晓燕 著

责任编辑 谢 焕
责任校对 仲亚萍
封面设计 水墨文化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66千
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171-5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目录

001	导言
015	第一篇 图像与性别
017	第一章 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早期法国挂毯艺术中的女性新形象
042	第二章 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贵族与时尚之诞生
057	第二篇 性别与政治
059	第三章 《萨利克法典》的“神话”与法国无女性继承王位之传统
086	第四章 16—17世纪法国女性摄政与君主制的发展
109	第三篇 话语与政治
127	第五章 18世纪法国思想界关于法兰克时期政治体制的论战
166	第六章 启蒙时代的蒙昧——热窝当的怪兽事件

179	附录
181	《年鉴》杂志与法国历史研究的新动向
197	后社会史的理论与实践：从传统史学到新文化史的演变
211	所收文章原发表信息

导言

完成了《革命与霓裳》一书之后，我已经有足足3年没有任何涉及服饰文化的文章发表了。从表面上看，我个人的研究领域似乎发生了不小的转变，实际上，我研究的根本兴趣点依然是政治文化的问题，只不过，从时间段来看，或许有向近代早期迁移的趋势。早在初步接触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这一研究题目时，我就已经意识到大革命时期许多政治社会问题的根源需要到此前的历史中去探究，所以这种时间上的前移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且，虽然关注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变化，但我讨论该时期政治文化的切入点与核心视角仍旧是性别问题。在研究政治与性别的关系的过程中，我也对政治与话语之间的张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外，图像资料也始终对我的研究工作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所以，本书的主要内容便是围绕着法国近代早期政治文化中的三个领域——性别、话语与图像来展开，收录了近几年来在这三个方向上的一些研究心得。至于本书的题目，在我看来，研究和讨论真正的政治斗争与政治事件，就像是画工笔画那样细细描摹与刻画政治最为人所熟知的面貌，而我自己更醉心于徘徊在政治文化的边缘模糊地带，比如政治舞台幕后的女性，比如历史上某一场论战，尝试着用浓淡不尽相同的笔墨去描绘政治的诸多形态与各种投射，去抓住它的“气韵”，或许可以更深入、更生动

地理解那个与我们不仅隔着不同的语言与文化，更横亘着数百年历史的时代。

首先谈一下政治话语。政治吸引我之处在于它的多面性。政治人物、政治事件，自有其他研究者深入研究，我感兴趣的是它的话语体系。在一个政治体制之中，话语是如何通过叙述、辩论、批驳等方式来塑造某种政治传统或者意识形态的故事。话语体系分别是被哪些人群所掌握的？他们的意图如何通过话语得以实现，或者如何被不同阵营的话语体系所攻讦？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如何并行不悖或针锋相对？而更重要的是下述两点：首先是话语与事件之间的关联，即话语体系与实际的政治局势之间的紧密连接，后者如何影响前者的变化，前者又是如何反过来传播，甚至塑造与支配后者，这是理解政治话语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其次是新旧话语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一套新的话语绝非凭空生成，新的话语往往是在不易为人所察觉的过程中，在旧的话语中慢慢孕育并成长，直至最后整个取代旧的体系。在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中，两者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冲突直至转化，是理解政治思想观念迭代更新的关键之处。

如同所有的语言体系一样，任何一种政治话语从来都不是连贯的、稳定的，它身处的环境与负载的意义均是变化的。如果说16世纪之前的欧洲民族起源故事多上溯至特洛伊战争乃是希望为本民族寻得高贵祖先，那么18世纪依然有法国学者持此主张，却是以此来反对法国王权受封于古罗马帝国的提法。又如，拥护君主制的观点自12世纪开始便连绵不绝，但早期君主制拥护者的脑海中从未出现过强大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系，他们的理想是有一位明主以美德与审慎、公正与睿智治理国家，代上帝行牧羊之职。这与17、18世纪鼓吹王权至高无上的论点有天壤之别。因此，政治话语并不是简约抽象的观念，它们是具体时代、具体政治语境中的产物，有

其特定的对象与意图，理解这些，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某一特定时期人们的真实想法。

更需要注意的是，话语本身的推演逻辑有时会引发出作者自身并未意识到的方向。这一点在旧制度晚期关于政治制度的讨论中显现得尤为明显。高等法院人士为了对抗王权，引入公意的概念，意在为高等法院的权威性提供支持。但随着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公意成为第三等级主张平等权利的重要武器。政治话语就这样脱离了其言说者的掌控，向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最后成为法国大革命激进化的重要动因。

在本书中，我选取了法国旧制度晚期一场宏大的辩论与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历史事件，通过对话语与事件的分析来尝试呈现政治话语自身及其与政治局势之间的复杂关系。18世纪初法国人关于国家最初的政体形式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当然，有关法兰克时期政治体制的讨论并非此时才开始，它始于文艺复兴晚期，受当时人文主义影响，法国学者则从历史批判视角剔除了过往叙述中的神话色彩。论战延续至18世纪启蒙时代，思想界分为贵族派与王权派，双方观点对立，但均以古代政体的历史为依据为自身合法性辩护。此后，受18世纪中叶政治局势的影响，启蒙思想中的公意和理性观念渗入论战，使其日趋激化。随着第三等级的介入，历史的合法性逐渐让位于公意与理性，以致历史本身的权威性最终遭到全面否定。这场论战拉开了法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序幕，并为推翻旧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与话语资源。这一思想脉络归纳起来看似简单清晰，但在真正的历史过程中，在观念日益激进的18世纪下半叶，政治局势的跌宕起伏深刻影响着观念的演变。50年代中期，高等法院与国王之间的剑拔弩张，促使以法官、律师为首的“袍贵”将国民意愿引进辩论之中，突破原先之限于贵族与王权之间的论战，拓展了历史的主体。70年代的“莫普改革”，导致大

批改革反对者聚集成松散的群体，这一群体深受启蒙思想影响。如此，自然理性逐渐成为衡量政治制度的标准，关于制度的辩论逐渐从启蒙和理性的角度寻找新的、更有力的话语资源。于是，在这场历时弥久的辩论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政治话语与政治观念如何与政治事件之间发生密切的互动。

18世纪的政治话语世界中，除了上述这种广为学者所知的大型论战以外，还有许多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巨波但此后却湮没于历史长河的“热议话题”。而这些话题恰是了解当时的政治话语体系多面性的绝佳途径。关于“热窝当怪兽”的讨论就是其中之一。路易十五执政期间，法国热窝地区据报出现了食人怪兽，引起民间巨大恐慌，惊动凡尔赛。于是大贵族们率领军队迅速前往猎兽，终于凯旋。今天看来，这件事疑点颇多，但是这个甚至有点荒诞不经的故事在当时却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民智未开的可笑传说，但贵族与精英阶层的积极介入又不得不让人对此多几分思虑。联系到法国当时刚刚在“七年战争”中惨败于英国，以保家卫国安身立命的贵族等级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那么打败传说中的“食人怪兽”虽说不能挽回“七年战争”失利的局面，但至少在舆论上或许也能挽回几分颜面。因此，“热窝当怪兽”所引发的讨论绝非仅是怪力乱神的民间猎奇，更是一个昔日辉煌与荣耀的等级在其摇摇欲坠的命运之前所做的最后挣扎。英国史家史密斯已对该事件撰写了著作加以详细分析，金玉在前，在本书中，我只是对其大作做一简单介绍及评述，以期国内读者对此略有了解，也是用以佐证这个观点：看似普通的时事话题背后往往与更复杂的政治话语体系互相勾连。

政治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同样错综复杂，至今，女性主义者内部对于性别不平等产生的根源与伴之而来的历史现象的解释远未达成一致。加之

官方档案或者史料中关于女性的部分少之又少，研究性别与政治的关系往往给人一种雾里看花之感。从古希腊城邦开始，西方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便是男性，然而女性绝非与政治毫无关涉。在许多隐秘的角落，在舞台的幕后，甚至在某些特定时刻，在舞台的中央，也会出现女性的身影。从14世纪克里斯丁·德·皮桑的《女士之城》开始，法语世界就开始为出色的政治女性著书立传。不过，作者们的眼光始终更多关注历史上著名女性的智慧才能或祸国殃民的行径，往往把女性对于政治的影响归结到她们个体的能力或性格，例如，认为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露易丝能够摄政多年是因为其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与高尚的德行，路易十六的妻子安托瓦内特最后被送上断头台则归咎于其爱慕虚荣、奢侈腐化。这样的论断缺乏对于权力的运作与性别之间更深层的分析。因为政治与性别的关系绝非简单的排斥与介入之间的张力，而是一系列更为复杂的界定与塑造、依存与限制、拒斥与合作的关系。

例如，在探索现当代法国女性在政治领域遭遇困境的根源时，不少女性史研究者会把矛头指向《萨利克法典》，将其解释为法国女性被排斥出政治领域的一大缘由。这显然就是把政治与性别的关系简单化为这种观点：女性在政治领域总是被排挤、被压制甚至被禁止的。但是如果仔细研读有关《萨利克法典》在14—15世纪历史的文献，就会注意到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清晰。一方面，无论是从《萨利克法典》本身的民法性质探究还是从15世纪法国法学家们对其所做的重新阐释去考察，均会发现，作为一部法典而言，它绝不是针对女性涉政而立的。但另一方面，事实上，在法国长达数个世纪的君主制期间从未出现过女王，确实又与这部法典有着莫大关联，它甚至影响到近现代法国女性追求平等的政治权利。那么，这部从16世纪开始被视为法国“基本法”的《萨利克法典》究竟是如何被捧上

“神坛”，成为阻挡女性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有力武器的呢？这就需要回到《萨利克法典》在14世纪初被重新发现的历史语境之中，仔细梳理当时的政治局势以及相关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才能看到有些貌似与性别完全不相关的政治事件如何深刻影响到此后数百年间女性与政治的关系。而在充分了解当时及此后法国思想界关于性别与政治的思考与讨论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理解这样的影响何以发生。这一经典案例也让我们看到“女性不能继承王位”这样一个原本含混不清的性别政治观念，如何在一桩桩政治事件的演进中，在层层观念的渲染中，摇身变为国家政治特质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政治与性别，事件与观念，在此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它们之间的复杂脉络。

不过，整体而言，法国政治史上女性确实处于边缘地带。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女性在政治中就是处于被压制、被剥夺的境地，我们可以时不时看到女性的身影闪现在某些特定时期，而这些大权在握的女性也没有像卢梭或者黑格尔认为的那样，是天生的“政治颠覆者”^①。恰恰相反，她们以女性的特殊身份，为政治架构的完整性填补了非常重要的部分。本书中关于法国女性“摄政”问题的讨论就聚焦于此。

法国政治文化中具有强大的排斥女性的传统，但同时，法国历史上又有大量女性摄政的现象存在，尤其是在近代早期的16—17世纪，虽然亦有反对之声，然而主流社会却对此大力支持。若从当时的文本材料出发探究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的成因，就会发现，事实上，在性别话语的表象之下，关于国家主权与国王人身之间的关联及其行使权力的分配才是女性摄政问题的核心。这也是法国君主制发展至此阶段的两大特征所决定的：

^① [美]卡罗尔·帕特曼：《性契约》，李朝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家国一体”的概念在政治文化中依然具有重大影响；与此同时，王权日趋强大与成熟。关于女性摄政的论战，实际上是在国家权力架构日趋成形的过程中，关于国家最高权力归属与如何行使的一场讨论。由于讨论从女性摄政的角度展开，因而又介入了性别意识形态的层面，政治讨论借由性别话语展开。

关于摄政问题争论的核心问题便集中体现为：在国王尚未具备亲自掌权的能力之时，究竟该由谁来代替他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换言之，争论的关键不在于应不应当有摄政，而是国王的母亲是否为合适的摄政人选。事实上，在女性摄政的支持者看来，摄政之人并非其自身在统治，而只是在替国王执行权力，真正的统治者乃是国王本人，因而他们所臣服的只是国王本人的权威，而绝非代行其事之人。概言之，王位的神圣性与象征性在此时已经与实际的统治行为相分离。从另一方面而言，恰是国王的母亲这一角色使女性成为摄政天然的最佳人选。因为如果说先王的叔伯兄弟都是王位潜在的觊觎者，而且他们往往手握重权，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那么作为国王的母亲，她本身已经被《萨利克法典》排斥在王位继承序列之外，绝无戴上王冠的可能，并且作为一位外来者（法国王后多为欧洲其他王室外嫁来的公主），她在法国也不可能拥有多么深厚的政治根基。她唯一能合法依靠的只有年幼的国王，与其命运休戚相关。因而，拥护太后摄政的力量并非是出于认可女性的政治能力与政治德行，而是相信在王室统治不稳定的特殊时期，太后是唯一能够维系最高权力运作、保持各方势力均衡且又能维护幼王权益的人选。这样的拥护纯粹是政治的选择而无关性别。

通过对这些政治事件或者讨论的分析可知，不论是关于《萨利克法典》还是女性摄政，不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他们的真实意图并非讨

论性别，其矛头所指乃是政治，就像杰塞在论述《萨利克法典》时所指出的那样，“排斥女性并非一个基于性别的原则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性别问题只是表象，更深层的是关于权力的承袭、分配及运作的问题。女性是被政治排斥抑或被接纳，其根源并不在女性的性别身份，而在于特定政治环境的需要。

就像林·亨特指出的那样，性别的重要性不仅已经充分显示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中心地位，肇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史研究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对文化史的方法论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不仅是文化史的方法论，在更广泛的政治史或者社会史领域，性别范畴的引入都对方法论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例如法国学者苏菲·维尔涅于2016年出版的《女投石党人》一书是关于17世纪投石党运动中贵族女性的活动的，作者从女性的角度描绘出一场与以往史家笔下的投石党运动有着诸多差别的政治运动，这场影响了路易十四日后统治方向的运动成为贵族女性整体从政治舞台的台前隐退的最后演出。这样的研究并非满足于从性别角度添加一些新的研究子课题，用以弥补之前的空白，而是以女性社会政治实践来重写书写历史，用以往那些被忽视的领域，如女性之间的书信往来、联姻网络、庇护关系，来重新看待与审视过往种种，从而对整个政治史的研究范例提出挑战。加拿大女性主义者尤施卡借用葛兰西的“霸权建构现实理论”这样说道：“传统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良性的：从一开始它就是意识形态，是掩饰社会权力运作的方式。在神话和仪式中，传统都是隐形和（或）显性地发挥作用，给神话和仪式加上一层权威的光环，而同时，传统又通过参照固定时间呈现出秩序的意义。”^①因此，研究性别的历史就

^① [加]达琳·尤施卡：《性别符号学：政治身体/身体政治》，程丽蓉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是祛除这层以传统或者历史的名义给性别意识形态蒙上的权威光芒，揭示它的运作机制。

如果说性别为政治史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那么无论是传统的政治史还是方兴未艾的性别史领域，史料种类的日趋多样化亦是近年来值得关注的现象。关于历史研究究竟应当如何使用文学材料的讨论尚未结束，引起更大争议的图像材料已开始大规模进入史学领域。就我个人而言，这几年接触到的法国历史研究者或多或少都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采用图像材料，其中包括非常传统的政治史学者，如专治法国大革命史的法国学者米歇尔·比亚尔，以及文化史大家罗什的弟子安托万·李尔蒂及斯德法纳·万戴姆等人。英美学者在这一方向上走得更早更远。林·亨特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中关于大革命时期对于王后安托瓦内特的舆论是如何形成的便是在分析当时的画册基础上成文的。然而，用图像作为主要分析材料进行研究从潘诺夫斯基时期便开始遭受质疑，批评主要集中在下述几点。首先，对于图像的解读不像文字材料那么确凿，难免会带上解读者个人的主观判断与推测。其次，图像的创作过程往往已经不可考，创作者的真实意图与表现出来的意图之间缺少重要环节。而最重要的一点，彼得·伯克概括得非常精准，他说：“图像学的方法有可能缺少社会的维度，忽视了图像的社会背景。”^①然而，即便遭受着这样那样的质疑，图像依旧如同此前的文学材料一样，在历史研究的场域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不可忽视的证据来源。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恰当地、谨慎地使用图像材料，便成为以图证史的方法论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问题事实上在我进行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女性服饰研究中已显露出来。当时，这项工作带给我的最大福利是可以肆意徜徉在各类大大小

① [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小的博物馆里，而不觉得自己是在荒废时日。不得不承认，我喜爱卢浮宫远胜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凡尔赛宫的吸引力也远大于国家档案馆。因为，在这些场所中，物品与图像包围着我，我痴迷于那个已经逝去的世界留下来的真实的证据。当我细细端详一把16世纪的椅子之际，椅子的主人或许就在上方的画框中静静地注视着400多年之后的这位东方来客。这种与过去发生的切实联系让人心颤。可惜的是，文字能激起的兴奋与激动，在我这里，要少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从研究的初期开始，图像便成为我最心爱的材料。但是，图像材料的不确定性又对研究工作造成相当大的障碍。当面对着一幅18世纪的匿名宣传画时，我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创作了它，也不清楚它的潜在受众究竟是哪些人，他们看到这样的画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甚至，有的时候，我都不清楚面对的某些图像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是为了给戏剧舞台提供灵感，还是当时的裁缝创作的最新时装款式？在这样的困惑中，又如何能够恰如其分地分析伯克所谓的“投射到图像中的态度与价值观”？因此，每一次使用图像材料都不啻为一次冒险；而另一方面，关于女性的材料在传统档案中如此之少，因此大量女性图像的存在让人不得不进行这样的冒险。

图像资料的种类非常丰富，从最常见的绘画、雕塑、壁画到建筑、家具乃至装饰艺术中的各类器物。本书选取文艺复兴早期欧洲挂毯艺术中的女性形象作为从图像材料入手研究女性史的一次尝试。从法国国立中世纪博物馆以及卢浮宫现存的挂毯藏品来看，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早期法国挂毯中的女性形象相较之前的女性图像资料而言，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题材从宗教场景向日常生活场景蔓延，女性在其中占据的位置也相应发生重要转变，有时，女性形象甚至占据着整张挂毯最主要的位置。并且，挂毯中还有不少渲染幸福美满的两性关系的场景。由此产生的问题便

是：是否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背景下，人们因为对尘世生活的观念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所以对待女性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呢？

通过细读当时的文献资料，我们会发现，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直观。一方面，人文主义的兴起确实使人们对于女性的看法观念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这一点在不少文本中亦可获得证明。但进一步探究则会发现，这一变化的脉络与根源似乎还能追溯到更遥远的12世纪的圣母崇拜以及中世纪时期经久不衰的“骑士爱情故事”（亦被称为“典雅爱情”）文学传统。因为文艺复兴早期挂毯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与爱情场景在一定程度上都非常符合“骑士爱情故事”中描绘的那种将为女性出生入死视为骑士精神最佳体现的场景。因此，挂毯中的女性形象与两性互动场景究竟是现实生活的直观投射，抑或只是中世纪文学中的诗意场面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换言之，这些女性场景是否只是挂毯产业中的“程式化”、“套话型”的产品符号而已？

从图像回到上文谈及的女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历史上掌权的女性往往非常善于利用图像迂回曲折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例如在流传下来的多幅图像中，萨伏依的露易丝以虔诚的信徒、严格的母亲、英明的摄政太后等多重形象来表现自己作为王太后的官方形象。这是历代女性统治者惯常使用的方法，即通过强调与男性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也是现实世界里，在男性主导的政治领域中最常见的女性触及最高政治权力的途径的客观反映。而路易十三的母亲美第奇的玛丽在17世纪初向当时著名画家鲁斯本订购的整套大型油画就显得比较特别，因为在这一系列围绕着女主人公生平事迹的画中，玛丽或被古希腊罗马中的各种神话人物围绕，或直接化身为胜利女神的形象。除了描绘玛丽与亨利四世联姻的那幅作品以外，其余画作的中心人物均是这位王太后。

并且她很少以温柔妻子或者慈爱母亲的形象出现，而是一副手握天平、君临天下的高大形象。考虑到绘画创作的年代可知，当时路易十三急切想要夺回母亲手中大权而造成母子关系剑拔弩张，因而王太后或许想要通过这一系列画作向公众宣扬她才是法国政治的统治者。

除了女性统治者因自身政治需求订制这类政治宣传画之外，有时候女性的图像也是出于国家或者国王的政治目的。法国学者艾莲娜·维耶诺（Éliane Viennot）曾注意到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亨利的宠妃，普瓦捷的戴安娜经常在画作中被描绘为狩猎女神戴安娜，这不仅因为两者有着相同的名字，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官方的、宫廷的宣传艺术：用国王宠妃的画像来表现君主制的强大——野兽被戴安娜驯服代表着城市对君王的臣服；与此同时也传递出以国王情人为主的女性势力在当时宫廷中的重要影响。所以，对于戴安娜画像的解读，不能只停留在识别出她装扮成与自己同名的女神这一层面，因为这些画作的问世并不是宫廷贵妇闲暇之余的无聊之举，而是16世纪上半叶法国王权在逐渐强大的过程中的政治宣传。历经数个世纪，以图像为主的挂毯或者绘画作品所传递的信息远比我们所认为的复杂与细致得多，如果只是贸然“看图说话”，而不将其与同时代的其他材料——包括文字材料以及其他类型的图像资料——相印证，抑或没有对相关时代背景做细致深入的分析，则很有可能做出错误甚至荒谬的判断。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对17世纪时尚服饰的研究过程中。除了常见的绘画与雕塑等形式以外，时尚服饰也是权力通过视觉化的方式进行自我建构与展示的一个途径，而这一途径到目前为止尚未受到研究者足够的关注。如果其中再加入性别要素，那么整个议题就会变得更有趣也更富有挑战性。服饰与文化、社会乃至政治的密切关联，已毋庸多言。但如何分析

与阐释其中的关联，仍是当今时尚文化史研究中的难点。不少研究者认为近代早期的服饰，尤其是宫廷服饰，是君主制重要的统治工具，君主利用服饰来展现权威、划定阶层并以规定宫廷贵族的服饰来强化忠诚与服从。当时有观点认为，奢华的时尚服饰并不是表面上的浮华浪费，而是维系君主制必要的手段，因为豪华的服饰是君主内在威严与德性的体现，也让贵族时时谨记自己出身高贵从而令言行举止处处优雅，合乎礼仪。此外，在近代早期商业文化兴起的时代，人们相信时尚奢侈服饰的消费有利于社会财富的流动。所以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的王室，都深谙运用时尚服饰之道。而路易十四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其统治凡尔赛的岁月里把服饰政治运用得出神入化。所以，像英国历史学家菲利普·芒塞尔和法国史家皮埃尔·佩罗都据此认为服饰时尚的起源便是在路易十四的宫廷之中，换言之，时尚兴起的根源应该在于法国奢华的宫廷文化之中。然而社会学家吉尔斯·李波维斯基更愿意把服饰时尚的发展看作是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兴起的结果。他认为时尚之缘起是因为人们希望用服饰来表达个人，并不是用此来显示对君主权威的追随，因此，这是个人主义与平等自由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关于服饰时尚兴起的缘由，众说纷纭。本书用一篇小文的篇幅简单探讨了法国服饰时尚诞生的历史背景，希望从中窥探到服饰时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如何展现并且介入到真实的历史与政治中的。

达恩顿曾经说过，逝者世界有一种深不可测的陌生感，史学家们被他者的世界所同化，却不能为现实人们所理解。我个人并不介意不为现实人们所理解，但却深深困惑于过去世界所带来的陌生感，而政治、性别和图像就是我尝试去理解那个世界的三条主线，它们结合在一起，成为帮助我打开未知大门的钥匙。不过，我个人感觉，距离真正了解那个世界，还依